

《恩主》与法国“新小说”

陈文钢

(江西财经大学 中文系,南昌 330013)

摘要:桑塔格的处女长篇《恩主》深受 20 世纪 50 年代的法国“新小说”之影响,其文本中情节被消解,人物与叙事者被驱逐,最后只剩下叙事形式的魔方,从而宣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信任关系的终结。其创作实质是“新小说”观念直接影响下的实验。

关键词:苏珊·桑塔格;新小说;形式;故事;人物;现实;叙事

苏珊·桑塔格,美国当代小说家、随笔家,一个激情洋溢地支持先锋派艺术的批评家,其著名批评文集有《反对阐释》、《论摄影》、《重点所在》、《疾病的隐喻》,其小说作品先后有《恩主》、《死亡之匣》、《火山情人》、《在美国》。

《恩主》是其处女长篇,与作为批评家的桑塔格的美学思想最有互文性,但至今很少有研究对这部作品的美学理念及深层原因做过探讨。笔者认为,对《恩主》的成功解读,会更好地触摸到她后期的小说创作观念变换,并进一步反观她的批评主张。

本文欲对《恩主》进行叙事方面的关注,并分析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桑塔格的《恩主》在叙事过程中消解了文本的情节,驱逐了人物与叙事者,使小说最后只剩下可被分析的叙事形式的魔方,从而向世人宣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信任关系的终结。此种影响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法国“新小说”强调的对小说传统叙事形式的摒弃。但艺术不仅仅是技术,桑塔格在文本里的实验技术成功之时,也是其小说艺术失败之日。

一 致命的形式

《恩主》的叙事中,主人翁希波赖特的多个梦是小说的主体部分,梦之外的叙述在梦与梦之间穿梭往复。桑塔格重拾这种传统形式,使习惯了传统意义追问批评方式的读者去思考桑塔格文本的意味。

《恩主》里的梦大都断简残篇,形式上互相可以独立。到了第 2 章写梦境,这种传统叙事的方式转入另一种形态。以非现实的梦境和幻觉为主,而现实对梦并无影响,梦反过来影响和左右生活世界。希波赖特生活中主要内容是阐释、研究和模仿自己的梦,如他和其情人安德斯太太的性爱,他就曾说:“我不是在找梦来解析自己的生活,而是在寻找生活来释梦。”^{[1]36}这种逆向运动毫无疑问是反生活逻辑的,这昭示了与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截然不同。本雅明在《超现实主义》一文中写到:“只有当每个人的清醒与睡梦之间的界限已经磨灭之时,生活才最有意义;其时大量的形象纷至沓来,语言也成其为语言,声音与语言精确而巧妙地相互自动渗透,根本找不到需要填充所谓意义的裂缝。”^{[2]190}传统现实主义叙事里,梦与幻想是生活的投影、反映、延续和模仿。所以,桑塔格这样叙事传达出来的信息可以理解成,所谓现实就如梦境般让人感觉破碎、荒诞而难以把握。就象希波赖特在文中第 7 章结尾处自问:“假使脸不见了,而微笑还在,情形会是怎样的呢?如果梦所寄寓其中的生活枯竭了,而梦却长做不衰,情形又会是怎样的呢?哦,那样的话,人就会真正地自由,人的负担就会减轻。自由是无与伦比的。”^{[1]84}《恩主》里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现实观。

让·雅克,主人公希波赖特的一个朋友,过着一种多重生活,随时都要换一副面孔出现,身兼多

收稿日期:2008-03-03

基金项目:江西省“十一五”(2006-2007)社科规划项目“苏珊·桑塔格文艺思想研究”(06WX44)

作者简介:陈文钢,男,江西铅山人,江西财经大学中文系讲师,文艺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与批评方法。

职:拳击手、小说家,同时也是小偷和男妓。作为一个重要角色,雅克与希波赖特形成一种二元对照。雅克生活的多层面对于主人翁来说,是只能出现在梦里的幻象。“我囚禁在那两个房间的梦使我生活的天地变得狭窄起来,结果,我想得越多,出门却越来越少。弄得我父亲又一次来首都出差几天的时候,我竟然忘了去看他。”^{[1]21}希波赖特携带着作者对自己生活的自嘲,作者在《恩主》的序言里承认,这是她当时思考的一个问题,即若一个人把自己交给自己的幻想,结果意味着什么?希波赖特作家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的意识主体,因此可以说他是作家意识的实验者和作家对另一类可能生活的“一种探询者”。^{[3]8}但这种可能的生活与现实有什么关系?

通常来说,梦是相对于生活而言的,而梦与生活相似点就是我们虽说它不够现实,却不能不说它也是一种真实“体验”。就像希波赖特问的那样,过去的人们在我们心里的地位难道不是类似梦中的人物吗?这相似性使得人生与梦的荒诞交错有了逻辑基础,梦的逻辑可以模仿生活,可以反生活,可以超越生活的逻辑;况且,所谓生活里的事实在逻辑上未必等同于真实。因此,如果仅仅是梦,文本仍然有着可供阐释的基础。

仍然是文本中,希波赖特的梦里人物基本上面目模糊,那个拿笛子的人有时候气势汹汹地狠揍希波赖特,但有时候“我”也愤怒地揍他,有时候他又变得比较友善。这里的人物“作为各种相反的符号推动下兼收并蓄的复合体(暴戾/温柔,正直/投机,勇敢/懦弱),变得无法捉摸、无法分类。这是因为一种结构方面的动机代替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动机,往往使人物的行为和动作显得不适宜而无条理。”^{[4]132}象这种类似的事情充斥于梦里,梦里的“故事”最终以破碎的面目展现,这种非线性的梦里“故事”终结了被阐释的有机性。在这样的梦里,即使有所谓情节的片断,情节与情节之间也并没有什么关联。把它们分割成一个个小故事,希波赖特为其中的红线,读者仍难获得一个故事大致的结构,它们的互不支持使得读者难以从文本中找到理解的契机和通道,我们得不到一个“故事”,阐释的可能因为故事消失而消失。

有学者指出桑塔格深受法国存在主义的影响,对荒诞派喜剧情有独衷。出于她本人既从事理论又从事批评实践的背景,其创作出小说来难以避免她哲学观念的影响。这样以上现象不无道

理,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我们必须指出一个事实,即在桑塔格的批评理念中,她一直与之战斗的一个阐释观念就是弗洛伊德主义。桑塔格在接受杨小滨、贝岭采访时说,她写《反对阐释》这篇文章的初衷是反对当代风靡一时的把艺术解释成别的东西的潮流,这是简单化了的对艺术作品的解释,尤其是那些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和弗洛伊德式的简化。她曾经直截了当地在其文中指出:“最著名、最有影响的现代学说,即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实际上不外乎是精心谋划的阐释学体系,是侵犯性的、不虔敬的阐释理论。”^{[5]18}在桑塔格的论述里,心理分析的理论把所观察到的现象都放入括号里,这些表面的东西在马克思以及弗洛伊德看来,如果不对它们进行深度阐释就毫无意义。《恩主》的创作无疑在实践她拒绝深层阐释的主张,因此才会有《恩主》的翻译者姚君伟所感觉到的,“桑塔格的理论写作和他的小说创作是带有互文性的,她的小说创作明显地受到其哲学思想和文学理念的影响。”^{[6]6}

那么,桑塔格如何贯彻她的这种观念呢?

传统小说叙事的几个因素最为关键的是情节与人物,现在情节的主干道被堵死了,那么,人物呢?前面已经说过,人物已经成了无法捉摸的复合体,这还是从其角色的角度来看。从叙述者的角度来说,小说开始不久,希波赖特自己说,他在写这本书。这无疑是说本书的所谓主人翁同时就在写这个故事。但至小说结尾处,叙事者的真实性也遭到消解。因为读者发现所谓的“我”的梦并不可靠,原因种种,其一是有人说“我”曾经被关进过精神病院。因此,前面的叙述是梦的现象还是精神病现象,难以界定。旋即希波赖特马上又否定了自己的记忆会出问题。但这种结论也还不是结论,因为不久他又语无伦次地说,“我”可能记错了,因为有一些信函和日记彻底否定了“我”记忆的准确性。这些都象是一个有着吃语症的人口中的喧嚣和骚动。叙事者讲的是否正确,最终成了由读者去猜度的悬案。到最后发现的一个笔记本上,希波赖特又看到了本书的草稿,第三人称写成,书名叫《你读的东西别全信》,书的梗概已经不再是梦了,重新出现更象传统的小说写法,逻辑清晰,不再凌乱。可是没有结束,一封希波赖特的信函的个人小传认为,前面写梦的叙述有一部分是梦,还有一部分是的确“真实”发生过的事。从信函写到最后的表述来鉴定,“我”

的话语逻辑又出现错乱。总之,读者在这里可以感觉到,到了本书结尾处,小说形式的变幻实际上达到了高潮,这个时候的叙事者已经完全失去存在的可靠性,读者对叙事真实性的追求彻底碰壁。到此,文本中故事情节不但被消解,叙事者都被驱逐,小说最后只剩叙事的形式魔方。

二 “新小说”的迷雾

论者认为,桑塔格在创作《恩主》时是受“新小说”派影响最大的时候。桑塔格于1957年拿到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但4个月后前往巴黎大学,在那里接受法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熏陶。此间她阅读大量欧洲哲学著作,同时出入于一批先锋艺术家圈子中,他们组成了一个由摇滚乐、新浪潮电影、“新小说”写作和存在主义哲学的新兴欧洲文化圈,苏珊·桑塔格在此时专注于“新小说”与“新电影”。因此,桑塔格当时在思想背景上不仅与存在主义关系密切,在创作探索上与“新小说”也是走得很近。这些可以在她的批评论著里得到佐证,《反对阐释》发表在《长青评论》的时间是1964年,《恩主》发表的时间是1963年。这段时间正是桑塔格亲密接触“新小说”和“新电影”之时,《反对阐释》这部文集许多文章都写于此时,如《纳塔丽·萨洛特与小说》写于1963年,改于1965年,《雷乃的〈慕里埃尔〉》写于1963年,1964年发表《罗贝尔·布勒松电影中的宗教风格》,她于同年还写了《戈达尔的〈随心所欲〉》,都是关于“新小说”以及“新电影”的论述。以上列举无非表明在创作《恩主》时,桑塔格同时也正沉浸在对“新小说”、“新电影”的思考中,如果说这些事件对她毫无影响恐怕并不可信。我们还可以从桑塔格在《纳塔丽·萨洛特与小说》读到她自己详细的论述:“整整一大批——我可否说是整整一支部队?——重要而具有挑战性的小说正在法国被创作出来。”^{[4]119}这种挑战性的小说实际上有两波作品,第一波作品大都写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并未翻译到美国去,由莫里斯·布朗肖、乔治·巴塔耶、皮埃尔·克洛索斯基创作。而后来的一波却更广为人知,它们是由米歇尔·布托尔、阿兰·罗伯-格里耶、克劳德·西蒙还有就是纳塔丽·萨洛特50年代的创作。“他们全都拒绝那种认为小说的职责是讲故事并根据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陈规来安排人物的‘小说’观念,他们竭力摒弃的,一言以蔽之,是‘心理学’观念……”^{[5]119}不管他们通过哪种形式和其他观念,

“其创作成果至少在否定的意义上都相似……”^{[5]120}这段话不仅显示出了“新小说”对现实主义的排斥,而且也可以为我们前面论述的对弗洛伊德主义的反抗提供有力的支持。到了“新小说”的后期,也就是60年代,主导这一时期的一个激烈主张是——决裂的激进化和人与世界的新关系的建立。

上世纪50年代法国“新小说”强调对小说传统形式的摒弃,企图摆脱传统叙事结构,将其研究拓展到形式实验等其他领域,其实质是挑战旧的认识论,在他们眼里“真实”并非“现实主义”维度上的“真实”。阿兰·罗伯-格里耶就曾毫不客气地指出,传统小说“单调地使用过去时和第三人称,无条件地以时间为发展,以情节为线索的做法,千篇一律地按照人的愿望去安排,每一情节关联等等——都是强调一个稳定和谐、连绵不断、没有歧义的、完整无缺的世界”,^{[4]98}在他看来这样的世界并不真实。对于可靠性,罗伯-格里耶对新小说中仍然包含了大量事件、波折、“故事”的解释是,新小说“缺少的并不是轶事,而只是它的可靠性、平静和单纯朴素。”^{[4]98}因此,“新小说”来势汹汹是冲着现实主义来的。

对于现实主义,桑塔格同样有一段很锋利的

话:
当我重读《名利场》和《布登勃洛克一家》时,不论它们看起来依然多么出色,它们还是让我直皱眉头。我不能忍受那种无所不知的作者向我展示生活是怎么一回事,赚取我的同情和眼泪,不能忍受他的肆无忌惮的冷嘲热讽,他的那种对他的人物无所不知的神秘的神气,不能忍受他试图让我(他的读者)感到我自己也对这些人物的了如指掌。我不再信任那些使我的求知欲获得完全满足的小说。^{[5]121}

她赞成萨洛特对小说的看法,即认为小说装饰场景、描绘人物和安排人物活动的传统手法,自身就难以立足。在新小说里,我们看到“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崩塌了,神人同形同性论的古老信仰破碎,现实的概念遭到怀疑。传统的艺术再现体系建立在世界是由表象和本质构成的二元概念基础之上,这种概念源自柏拉图的思想,而传统体系迫使作家穿透表象,突出心理的、精神的或形而上学的真理。这正是被罗伯-格里耶称为‘深刻的古老传说’。”^{[4]94}由此“新小说”的文本不再为先于它存在的那个“现实世界”负责,而意图创造一个

全新自主的自足的世界,通过自身来体现价值,他们坚持小说是虚构,而虚构的文本只能内求诸己,而非外在的阐释世界。《恩主》无疑向世人宣告了一个文本中的事实,那就是作者与读者之间从前那种的信任关系已经不再。

艺术的主张可以殊途同归,通过创造,或者破坏,桑塔格在《恩主》表现出来的艺术主张通过破坏这条曲径来成就。桑塔格的破坏最终把人物的可靠性与情节的连续性取消了,从而把聚焦点移到形式的感觉上来。这部小说的主体部分给人总体的印象无疑是深奥、晦涩和乏味的。对于此现象,桑塔格早有论断,即艺术没有必要要求自己保持有趣,“我们应该承认对乏味的某种利用是现代文学的那些最有创造性的风格特点之一——正如那些从传统看来丑陋、肮脏的东西业已成为现代绘画的基本资料,而沉默(自韦伯后)业已成为当代音乐的积极性的、结构性的因素。”^{[5]178}她主张小说放弃浅显易懂的形式,不固守老套的美学主张,而乏味和做作是转变期的代价。她说:“那些用各种花言巧语、连蒙带骗地强迫读者接受这个拙劣的小说的新一代批评家,必定使读者看到这种转变的必要性。这个过程越快越好。”^{[5]118}

传统的有机艺术品观念坚持这样一种观念:

有机的艺术作品是按照横组合的模式构成的;单个的部分与整体构成一种辩证的统一体。一种充分的阅读被描绘成解释的循环:部分仅仅通过整体才能得到理解,而整体又仅仅通过部分才能被理解。这意味着一种预期性的对整体的理解指导着部分的理解,同时又被部分的理解所纠正。这种类型的接受的根本性前提条件是假定在单个部分的意义与整体的意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必要的和谐。^{[7]158}

“新小说走到20世纪60年代后,从前10年的“统一性被侵犯的文章”走向“不可能统一的文章”,^{[4]30}后者建立在主体分裂和破碎的基础之上,这些部分不再是整体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一个将意象串起来的自动文本中的一部分可以失去,而文本本身却不会受到大的影响。如果我们试着把《恩主》中的梦删除几个,或者互调位置,对整部小说不会有太大影响。《恩主》的接受者最后发现,由以前阅读有机的艺术作品形成的理性对象化方式对于这部小说已不再适用,接受模式受到挑战。在接受者那里,深奥、晦涩和拒绝提供意义被体验为一种本雅明式的震惊效益。罗伯

-格里耶说:“如果你们在阅读中经常中断,几乎是笨拙地停住,如果文本本身、词句、篇章出现的同时还要求注意发生的某种法则,那么你们将看到一些非表现性的手段。”^{[4]197}

如果读者不是简单地放弃或满足于从《恩主》的一部分中推断出牵强的意义,他们就必须努力理解《恩主》的这种谜一样的形式魔方,将注意力放在决定《恩主》的形式构造原则上。因此,在接受过程中,《恩主》激发了一种断裂,它与作品的不连贯性(非有机性)相对应。这样,我们惯常在通过处理有机的艺术作品而发展起来的接受方式出现了不适应,震惊式的经验让意义的阐释行为被放弃。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很容易地得出,“新小说”是位于形式主义家族中的,这实际上本来就是“新小说”派所直言不讳的事实。不幸的是,桑塔格对形式(风格)的强调在《恩主》里最终演绎成了对故事的逃避,形式没有最终逃脱她反对的抽象形式的命运。故事不是“故事性”,正如H·G·布洛克在其《现代艺术哲学》里说:“形式同写实性和情感的内容的相互矛盾和对立只有在那种我们所抛弃和批判的‘外在’的或‘他治性’的意义上才有可能。”^{[8]170}而这种意义上的所谓“形式”就是一种抽象形式,只不过是那种再现性和表现性概念(他治性的)的另外一种说法。《恩主》的创作本是要突出小说叙事的形式变幻,但没有故事的支撑,小说的成功之处也许只有艺术史价值而非艺术价值。

实际上,即使在她对“新小说”、“新电影”极力鼓吹的情况下,桑塔格也理性地感觉到了一点,那就是“新小说”创作本身价值并不如人们想象中那样至关重要,重要的是它所引起的一系列批评以及批评之后的创作。桑塔格直接道出:“来自法国的对小说更有价值的成就,是受‘新小说’家启发的那一大批批评著作,它们代表着对小说这种体裁进行系统思考的一种及其令人钦佩的尝试。”^{[5]120}

现代艺术是一边多情地拓展艺术感受力的同时,似乎也在锻炼受众的忍耐力。这是多元化的代价,艺术不再在价值论上一争高下。只是,多元化与艺术价值论矛盾吗?后来桑塔格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毫无疑问地……忠于文学、音乐、视觉与表演艺术中的高文化经典。但我也欣赏很多别的东西,例如流行音乐……”(下转第26页)

言简练朴实,叙述性强,作者几乎不使用粗俗语,而小说的人物语言则安排了粗话、痞话。这些粗俗语既有骂人的,也有表示否定和加强语气的,还有作为人物口头禅的。他的小说主要塑造的是南方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形象,粗俗语又是活跃在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日常生活中的生动语言,因此作者充分利用粗俗语来展示农民和农村干部的本真生活和浓郁的农村风土民情。作者对粗俗语特有的文化内涵的认识应该是很深的,粗俗语作为男权话语的特殊形式,它能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人物的地位和道德修养,作者很好地运用了粗俗语来塑造人物形象,使其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形神毕肖。因此,粗俗语在向本贵小说人物塑造中产生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具有十分独特的作用。当然,他的小说中也有部分脏话粗语的安排和男

女情色的描写是出于刺激读者眼球,激发读者阅读兴趣的需要。这种情况下使用的粗俗语,无论从语言艺术还是文学艺术角度看都是不足取的。

参考文献:

- [1] 王希杰. 修辞学通论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2] 曹 炜. 《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 [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4
- [3] 威廉·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97
- [4] 根据笔者对向本贵采访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黄声波)

(上接第18页)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废除等级制,并不意味着把一切等同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我对传统文化等级的偏袒和支持,并不亚于任何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我不以同样的方式划分等级……举个例子:不能仅仅因为我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表示我无法喜欢布鲁斯·斯普林斯廷(美国著名摇滚歌手)。如果有人说你非得在俄罗斯文学与摇滚乐之间作出选择,我当然会选择俄罗斯文学。但是我不必要作出选择。^[9]但这是桑塔格30多年后做出的悄无声息的转变,这之前从桑塔格对一些传统小说的愤怒可以看出,在受到“新小说”的影响时候的她是有着狂飙突进色彩的。那时她还年轻,如果没有这种标新立异的血气,《恩主》的创作也许难以为继。

参考文献:

- [1] 桑塔格. 恩主 [M]. 姚君伟,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

- [2] 本雅明. 本雅明文选 [M].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3] 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 [M]. 董 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4] 米尔西亚. 新小说·新电影 [M]. 李 华,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 [5] 桑塔格. 反对阐释 [M]. 程 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 [6] 姚君伟. 听桑塔格讲那思想家的故事 [J]. 译林, 2005 (6).
- [7] 彼得·比格尔. 先锋派理论 [M]. 高建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 [8] H·G·布洛克. 现代艺术哲学 [M]. 滕守尧,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 [9] 陈耀成. 反对后现代主义及其他——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N]. 黄灿然,译. 南方周末, 2005 - 01 - 06

(责任编辑:黄声波)

ABSTRACTS

(1) The Design and Impact of "Device-typed" Sole of Contemporary Sports Shoes TANG Yong(004)

College of Fine Art, South China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0, China

Abstract: The "device-typed" sole is the main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sports shoes. It refers to the special-structured device in the sole which provides more efficient protection and counter force than sports shoes made of traditional materials. In addition, this device makes sports shoes lighter. The device-typed sole attributes its exquisite structure to the employment of high technology. Device-typed sole has become the focal point of sports shoe design and an important factor of commercial competition and marketing. Despite its present drawbacks,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device-typed sole design has become the major drive of sports shoe development.

Key words: sports shoes; device-typed sole design; shock-absorbing system

(2) A Dialogue Between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Comparison Between A Red Red Rose and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JIANG Yu-jiao, Cui Shu-li(010)

1.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2.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Henan 464000, China

Abstract: A Red Red Rose and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respectively reveal some semantic and pragmatic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in poetic discourse. The former uses definite descriptions and referents to sing highly of love, personal emotions and individualism, destroying the rationality-armed castle by Classicists; besides, it also employs some overt and explicit similes and metaphors which are of truth value to the love proposition, making itself the perfect in love poetry history; whereas the latter uses indefinite descriptions and referents to construct a virtual communicative context, casting a way "bold expression of emotions" and "ego-oriented poetic theory" by Romanticists; it also employs quite a few covert and implicate metaphors which go against the love proposition but are highly communicative, making itself the beginner of modern poetry and an exotic flower among the love poems.

Key words: A Red Red Rose;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semantics; pragmatics; dialogue; love proposition

(3) The Benefactor and New Fiction of France

CHEN Wen-gang(015)

Chinese Department,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China

Abstract: Sontag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New Fiction" of France in 1950s when writing her maiden work, The Benefactor. In the novel the plot is deconstructed, the characters and narrator are banished and only a labyrinth of narrative form is left, which declares the end of trust between the writer and the reader. This creation is essentially an experi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ew Fiction".

Key word: Susan Sontag; New Fiction form; narration; character; realism; narration